



徽麓書院 国学文库

主编 ◎ 朱汉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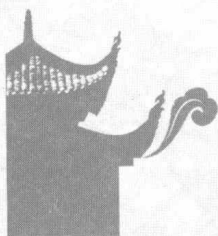


张天杰◎著

戴山学派 与明清学术转型

Jishan Xuepai
Yu Mingqing Xueshu Zhuanx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徽麓書院 国学文库

主编 ◎ 朱汉民

张天杰◎著

戴山学派 与明清学术转型

Jishan Xuepai
Yu Mingqing Xueshu Zhuanx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戴山学派与明清学术转型 / 张天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2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朱汉民主编)

ISBN 978 - 7 - 5161 - 4508 - 1

I. ①戴… II. ①张… III. ①哲学学派—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B248.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744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罗 莉
特邀编辑 孙少华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4.75
插 页 2
字 数 569 千字
定 价 8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工作 指导委员会

主	任	许又声		
副	主	任	李友志	
成	员	李湘舟	王柯敏	吕焕斌
		周发源	刘克利	
办公室主	任	邓清柯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编委会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名)

汤一介 张岂之 李学勤

杜维明 饶宗颐 袁行霈

主 编 朱汉民

编委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名)

卜宪群 王子今 王继平 张怀承

吕锡琛 刘海峰 朱汉民 李 零

李存山 肖永明 陈 来 陈 致

姜广辉 洪修平 莫砺锋 郭齐勇

黄俊杰 黄朴民 葛兆光 廖可斌

办公室主任 李 兵

总 序

朱汉民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即将陆续出版。借为这个文库作“总序”的机会，我想讨论一下这样几个问题：现代世界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传统国学还有什么意义呢？“国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吗？国学与岳麓书院有什么密切的联系？

（一）国学的意义

我认为，对现代中国和世界而言，国学至少有四个层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国学能够为现代人的个体精神需求提供思想营养。中国正面临社会的急剧变革，每个人的命运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每个人的行动也有更多的选择自由，但是，能够给我们驾驭命运的精神方向、作出行动选择的人生智慧却严重不足。现代中国人往往会感到是非的迷惘、得失的困扰，同时引发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社会底层民众是这样，那些成功人士也是如此。儒家、道家、佛家的经典，诸子百家的思想，对人生意义的选择，包括是非的迷惘、毁誉的困扰、得失的彷徨，以及对人生终极价值的选择，都能够提供很多很好的思想营养。今天很多人思考的问题，其实古代先贤都思考过，而且有非常好的解决办法。我们回头去看经典，原来的老祖宗已经有很好的思考了。

第二，国学能够满足当代社会建立和谐社会的需求，并提供重要的文化资源。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我们正面临着种种社会问题和思想危机。我们常常感到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乏信任，我们不相信超市里买来的食品是否安全，我们怀疑来自陌生人的帮助是否藏着恶意，我们甚至还在讨论见到老人摔倒该不该扶起，还有许多人的损人利己的做法，已经到了完全不能容忍的地步。诚信危机、道德危机成为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大

敌。大家都在想，怎么来制止相关恶劣事件的发生，怎么来建立一个有诚信、有道德的和谐社会。中国传统国学，对于如何建立有诚信、有道德的和谐社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忠恕之道，仍然可以成为建构现代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仍然是我们建立有诚信、有道德的和谐社会的金科玉律。

第三，国学能够为当代中华文明的崛起提供重要的支撑力量。当前的“国学热”其实和中华文明的崛起有着密切关系。中国崛起与中华文明崛起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崛起是指一个独立的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强大，而中华文明崛起则是强调一种延续了五千年的文明体系在经历了近代化、全球化的“浴火”之后，重新成为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文明体系。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是唯一历经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原生形态的古文明，并且一直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位居世界文明的前列。但是，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被瓜分、侵略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人开始失去文明的自信。其实，近代中国学习、吸收西方先进文明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坚持中华文明的主体性，采取对自我文化的虚无态度是非常不应该的。我们必须有一种文明的自我意识，我们要认识到，现代化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崛起。我们活下来并且能够昂首挺胸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首先应该是我们高贵的精神和灵魂！那么，我们高贵的精神和我们的灵魂是如何形成的呢，其实，就是国学熔铸了我们的精神和灵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能够为当代中华文明的崛起提供重要的支撑力量。

第四，国学能够为 21 世纪新的人类文明建构做出重要的贡献。我一直认为，中国国学里面所包含的许多价值观念，比方说仁爱、中和、大同，不仅仅对中华民族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们一定能够成为具有全球性的、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能够弥补某种单一文明主导的价值观念的缺失。西方文明一直在坚持他们倡导的许多核心价值。其实，中华文化近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接受这种西方价值的过程。但是，许多中国人在此过程中，却忽略或者忘记了中华文明中的价值理念。特别是在整个 20 世纪的文明史上，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文明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21 世纪建构的人类文明，一定是一种多元一体的文明，而延续五千年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一定会对 21 世纪的人类文明建构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国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尽管国学如此重要，但对国学是否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学界内部还存在着不少疑虑与分歧。人们首先会问，国学的确切定义是什么？其实，“国学”有非常明确的内涵和外延。首先，“国学”的“国”应该是指中国，这个很明确。其次，这个“学”就是指传统学术，即中国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这种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总是要通过文字、典籍的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中国古代文献典籍有经、史、子、集，所以今天人们所说的国学往往也分为经、史、子、集。

人们又会进一步追问：国学的知识构架和学理依据是什么？当然，国学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必须要有两个重要条件：其一是国学学科体系的内在条件，即国学体系的知识构架和学理依据；其二是国学的外在条件，即国学是否具有现代学术视野而能得到普遍承认并开展广泛的或全球化的学术交流。

国学这门学科，之所以在学界还有不少疑虑与分歧，与它在当代中国学术体制内的处境有关。现在大学院系的分科，基本上是近代引进西学而建立起来，分为理学、工学、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政治学、教育学，等等。尽管近些年各个大学纷纷创建了国学院，但是国学在当代中国的学术体制内并无合法性的身份。这样，我们延续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国学，在这种学科体制下只能变成其他学科的材料。比如国学中最重要的经学，在现代大学的学科中就没有合法的独立地位，我们不能独立地研究、学习经学，只能够将其分别切割到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法学、宗教学、教育学的不同学科。这样，国学中的经、史、子、集的不同门类知识，全部被分解到了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政治学、教育学的不同学科视野里面，变成其他不同学科的材料。

近代引进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政治学、教育学的不同学科，对于拓展我们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视野，确实有其长处，但也有其短处。中国传统学术是一个有着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其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有着内在联系。当我们用各门现代学科把传统国学分割之后，就有可能失去原来知识体系的联系和特点。每一种知识体系或学科框架，实际上是我们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具有主观性因素的图式。不同文明有不同的把握世界的图式，西方知识学有它自己的长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也有自

己的长处，譬如中国的知识传统具有整体性、实践性、辩证性的特点，以此成就了中华文明的世界性贡献。正因为如此，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应该保持对其原文化生态的、有机整体的学问特点的思考。国学作为这样一种原文化生态的、有机整体的学问特点，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其实，在讲到中国“国学”合法性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暂且借用西方大学的“古典学”的概念。在西方世界许多大学都设立了古典学系。这个古典学研究什么呢？它最初是以古希腊、罗马的文献为依据，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等等。古典学的特点是注重将古希腊、罗马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不是分别研究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在西方，古典学一直是一门单独的学科。我们认为，“国学”其实也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学”。如果我们用“中国古典学”来说明中国“国学”，可以提供“国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上述两个条件。一方面，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中国形成了建立自己特有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文明体系。建立“中国古典学”，也就是以中国古人留下的历史文献为依据，将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由于“中国古典学”是以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为学科基础，这是一门从学术范式到知识构架、学理依据均不同于现有的文学、历史、哲学学科的独立学科，这是“中国古典学”得以确立的内在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国学”概念仅仅能够为中国人自己使用，西方人则只能使用汉学，以“中国古典学”来定义原来的国学，“国学”具有了知识共享、学术交流的现代学科的要求，并能兼容国学、汉学，为中外学者所通用，这是国学能够具有现代学术视野并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外在条件。

（三）国学与岳麓书院

书院是一种由古代儒家士大夫创办并主持的学术教育机构，它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组织制度、基本规制、讲学形式，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书院继承、发扬了中国优秀的教育传统，表现出儒家士大夫那种追求独立的学术思考、人格自由的精神。书院将中国传统教育和传统学术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从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蓬勃发展，宋元明清学术文化思潮迭起，无不与书院这种独特学术教育机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岳麓书院是中国书院的杰出代表，在中国教育史、中国学术史上居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因其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卓著的学术成就，受到古今人们的普遍敬仰。继先秦诸子等学术思潮之后，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思潮。理学以复兴先秦儒学为旗帜，要求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力图使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振兴；同时，它又吸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学说，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岳麓书院创建于宋代，很快成为新兴理学思潮的大本营，学术界一大批有影响的著名理学家纷纷讲学于此。南宋乾道年间，被称为“东南三贤”的张栻主持岳麓书院讲席，在此聚集了一大批理学之士，并且形成了当时学界很有影响的湖湘学派。同时，后来被称“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著名理学家朱熹两次在岳麓书院讲学传道，更是形成了学术鼎盛的历史局面。岳麓书院成为宋代学术文化史最著名的四大理学基地之一。以后，许多著名理学家纷纷来此讲学。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讲学岳麓书院；明代中叶以后，理学思潮中的心学一派王阳明及其弟子王乔龄、张元忭、季本、邹元标等亦纷纷来岳麓书院讲学，使岳麓书院因新兴的心学思潮再度发挥极其重要的学术大本营的作用。明清以来，中国学术文化又发生重大变革，先后出现清代理学、乾嘉汉学、今文经学等不同的学术思潮，而岳麓书院一直是不同时期内学术思潮的重镇，从而推动着中国传统学术的创新发展，继续在中国学术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可见，岳麓书院在一千多年的办学过程中，一直是中国传统国学的重镇。宋以后的各种学术思潮、学术流派均以它为学术基地，如宋代理学派、事功学派，明代心学派、东林学派、乾嘉学派、今文学派，等等，许多学术大师如朱熹、张栻、陈傅良、王阳明、王文清、王先谦、皮锡瑞等在这里传道授业，又培养了一代代国学领域的著名学者。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下诏全国各地改书院为学堂，岳麓书院也于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后来又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堂、湖南大学。但岳麓书院遗址在战乱年代，一度受到严重损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湖南大学全面修复岳麓书院，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岳麓书院古建全面修复，基本上恢复了历史上办学最盛时期的建筑规制。与此同时，我们启动了岳麓书院国学研究、教育的复兴工程。近二十多年来，岳麓书院培养、引进了一批国学研究的学者，逐步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点及博士后流动站。岳麓书院学术、教育功能的恢复，是建立在现代高等教育

体制及学科建设基础之上的。今天的岳麓书院已经成为国学复兴的重镇。岳麓书院的明伦堂仍是讲授国学的讲堂；朱熹、张栻“会讲”的讲堂仍在举办国学论坛，斋舍也仍然是学者从事国学研究的场所。古代学术传统内核的经学、理学、诸子学、史学及其相关的知识学问，均成为岳麓书院的主要学习内容和重要研究方向。国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生态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学术文化类型，作为一种具有民族主体性的学术文化，国学确实不同于西学，因为它有不同于西学的文化土壤与生态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与书院有着共生的独特文化背景。

我们有一种传承中华学脉的强烈愿望，希望推动岳麓书院学术的现代复兴。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发生的一个重要文化教育现象。我们相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我们完全可以做好书院文化传统的转换、创新工作。所以，我们编辑、出版“岳麓书院国学文库”，也是与传统国学的当代复兴有着密切关联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书院、学者加入到这个行列来，盼望国学界的研究者能够不断赐稿，共同推动当代国学的繁荣！

甲午年于岳麓书院文昌阁

序 一

何 俊

关于明清学术转型，这是中国哲学与思想史上的大课题。从梁启超标举新史学起，包括梁在内，现代中国学术一直将它作为研究重点。

由于明清学术转型具有非常清楚的特征，从宋明理学转向清代考证学，同时这个转型伴随着巨大的政治变迁，明朝的汉人政权被清朝的满人政权取代，因此，对明清学术转型的研究自始就聚焦于两个问题，一是明清学术转型的性质，二是明清学术转型的原因。

梁启超的研究影响至今。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将明清学术转型概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认为清代学术的性质是具有科学精神并辅以专业组织，以实事求是为目标的学术活动，一洗宋明理学的玄远思辩特性，而造成的原因即在明清易代所引发的各种社会因素。后来学界无论是以启蒙，还是以实学来标示明清学术转型，都只不过是沿着梁的旧辙前行而已。梁的影响不限于国内学术界，即在国外，同样深具影响。

对梁启超的持论给予挑战的是钱穆。梁的立论重在明清学术的断裂，而钱的想法更主张明清学术的延异，清代的考证学既非无源之水，也非空穴来风。宋明理学固然以明理知心尽性为重，但其学术之中也自有考证的工夫，这在朱熹尤然；宋明理学关于心性理气的辩难又必然将导引出考证学的兴起。钱的论说在余英时那里获得进一步彰显，以“内在理路”的提出为国内外学界瞩目。

不能以为，钱、余师徒是要以自己的论说推翻或取代梁的观点。梁的论述不仅描述和符合显著的历史现象，而且在逻辑上也无疑是具有合理性的。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也许是理学转型为考证学与明清易代是再清楚不过的史实，也许是梁的巨大影响力，加之首倡之功，梁关于明清学术转型

的论述成为非常重要，几近唯一的见解，它范导并左右着后来的研究，后来学者虽有推进，却难辟新径。而钱、余师徒的研究揭开了梁说的遮蔽，从新的视角展示出明清学术转型的另一面相。因此，在明清学术转型的认识上，钱、余师徒的研究不应简单理解为是对梁说的推翻与取代，而宜作补充与丰富看待。

当然，除了具体的论说以外，钱、余的研究与梁的研究根本的区别，在方法论上讲，还在于前者摆脱了后者那种以欧洲为中心，将中国比附于西方的认识进路。也因为这种进路的取舍，前者的研究揭示出了历史显相背后的更为具体的过程，从而使该课题的研究获得长足的推进。

颇有意思的是，就方法而言，如果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是对梁的外缘进路的全然相反的补充的话，艾尔曼的研究则可以说是梁的外缘进路的进一步重要推进。以明清易代的历史显相来解释明清学术转型，即便是正确的，也是粗浅的。宋明理学延异为清代考证学，朝代更替，哪怕是发生在异族之间，政治具有巨大的影响，但与学术共同体的具体运作仍然有着一定的间距。艾尔曼非常有意义地在明清学术转型的研究中引入了知识社会学的方法，不仅深化了学界对于这个课题的认识，而且也引发了学界在研究方法上的自觉与拓展。

关于明清学术转型研究的这一粗略梳理，旨在说明，要真正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须在研究内容与视角上进行深化与调整。从已有研究来看，如何从明清之际的某个具体而重要的学派来透视明清学术转型，似乎仍付阙如。比如，刘宗周是宋明理学的殿军，并形成了重要的戴山学派，明亡之际，刘与门下许多弟子虽殉节，但他另外一些弟子门生，包括张履祥、陈确、黄宗羲三位重要弟子，都在清初继续着学术活动。学界关于刘宗周及其戴山学派的研究固然很多，但从明清学术转型的视角来进行分析，仍是少见。事实上，刘宗周及其戴山学派，恰恰是明清学术转型的重要参与者，刘宗周终结了理学，他的弟子们开辟出新的学术世界。

现在，张天杰博士的《戴山学派与明清学术转型》弥补了这个空缺。在这本书里，天杰从令人荡气回肠的明清鼎革之际刘门师弟子的生死抉择讲起，使我们一下体认到明清易代对于儒家学者平生所学揪人心肺的考验，还有什么比生死更严峻的测试吗？继而分析刘宗周的思想与戴山学派的形成，然后细论张履祥、陈确、黄宗羲在明清之际的学术探索与新辟，

最后讨论全祖望的工作，以此结束，很让人感到欣喜。天杰毕业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由湘返浙，与我同事，他让我就这一即将刊行的新著写些话，我因早年研究过晚明思想，也整理过刘宗周的文集，特别研究过他的《人谱》，尤其我也曾尝试过从全祖望来理解清初的学术思想，读天杰此书给了我很大的亲切感，故非常乐意地略赘上述。

2014年6月8日于杭州三墩

关联，这两大关联的梳理，以及其中的有机联系的揭示，当是本书的重要创获，发前人所未发。

时世、人生、学术这三者在研究之中加以有机结合，这是本书研究戴山学派的另外一个创新。明清之际社会政治的变迁，影响了戴山学派学者的人生经历与学术路径；而这些学者的学术又反过来对该时代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每个学者都不能脱离自己的人生而从事学术研究，人生的经历与感悟时常通过学术反映出来，有时甚至呈现出较为对应的关系。因此，探究思想家的人生，势必对理解思想家的学说有所帮助。书中研究刘宗周及其弟子的生死观、出处观以及学术路径的选择等问题之时，总能结合他们的人生历程加以说明。历史时代、学人行迹、生平交游等方面的探讨，对于梳理学派、学者的学术渊源、思想脉络有着多方面的意义。这样做了之后，既凸显了时代感，又表现了对诸多学派骨干人物思想的精准把握。书中讨论刘宗周戴山学的建构，充分关注其时代与经历、政治与学术等多方面的影响。在梳理其内在学术谱系之后，又梳理其交游与讲学，从而有了许多新的发现。比如刘宗周与朱子学的关系，刘宗周、高攀龙、陶奭龄的学术异同等，都是学界少有论及的重要问题。时世、人生与学术结合的研究，使得戴山学派发展的脉络清晰，同一学派在不同时世下的变化机理也由此被揭示了出来。

此外，本书还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理学与经学之间的关系。联系明清之际的经学发展史来对戴山学派加以研究，就会发现戴山学派的学者们对《四书》《易》《三礼》等经典文本都比以往的理学家更为重视；对他们的经学研究成果加以解读、梳理，深化了戴山学派学术谱系的研究。戴山学派的学者根据不同立场、方法对经典加以阐发，影响了后来学派的分化。特别是围绕《大学》一书的相关论辩，可以说是解开戴山学派分化的一把钥匙，本书对此问题的研究很有价值。二是对晚明与清初两个时间段里的书院、讲会的梳理。明清之际的书院与讲会，在内容与形式上也发生了变革。戴山学派的学者几乎都曾参与过讲会活动，张履祥与陈确曾在浙西组织过类似讲会的理学同道的集社；至于刘宗周、黄宗羲、全祖望三人则都曾是书院的主持者，越中与甬上两地的证人书院也都影响深远。比较他们书院讲学的异同，以及其中的承继关系，从这一角度来看明清之际的学术如何转型，非常有意义。

2006 年秋，天杰君进入岳麓书院，先后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他在书院的六年时间里，研经读史，博学慎思，学业上取得了很大进步；同时又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好友，在书院办刊物、兴讲会，组织各种读书活动，为古老的书院平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2012 年，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完成之后，获得了校外双盲评审专家的好评；论文答辩时，获得了五位答辩委员的一致称誉。2014 年春，天杰君不负众望，获得了湖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为自己在岳麓书院的六年求学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本书就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之上，修订而成的。记得三年前，天杰君的《张履祥与清初学术》一书出版时，我在序言中希望他不断为学界奉献精湛之作。现在看来，他在这里奉献的，的确又是一部精湛之作。

天杰君毕业后离开了长沙。衡云湘水没能留住他匆匆归去的脚步，在我的生活中也就少了一位朝夕相处的朋友。六年的时间里，我们由师生而朋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也融入了彼此的生活。曾经有很多次，我们一道流连于岳麓书院的曲折回廊与深深庭院，一道徜徉岳麓幽径，漫步湘江堤岸。而今，这些情景只能珍藏在记忆之中了，天杰君已经在杭州开始了新的生活。“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但愿远在钱塘江畔的天杰君，总能感受到岳麓峰头的朗月与清风。

2014 年 6 月 16 日于岳麓书院

目 录

序一	何 俊(1)
序二	肖永明(4)
绪论	(1)
第一章 明清鼎革之际的刘门师弟子	(26)
第一节 刘宗周出处与生死的抉择	(27)
第二节 生死:刘门弟子的殉明与抗清	(49)
第三节 出处:刘门弟子入清之后的人生抉择	(71)
附 论 刘门弟子的逃禅	(107)
第二章 蕺山学与蕺山学派的形成	(112)
第一节 蕺山学的建构(上):学术谱系	(113)
第二节 蕺山学的建构(下):交游以及学术异同	(144)
附 论 刘宗周与东林学派以及东林党	(165)
第三节 蕺山学的统合性	(167)
第四节 《人谱》与证人改过之学	(194)
第五节 刘宗周的讲学与蕺山学派的形成	(221)
第三章 蕺山学派的分化(上):张履祥与尊朱辟王思潮的兴起	(240)
第一节 张履祥所受刘宗周学术影响及其师门“补救”之功	(241)
附 论 张履祥与其他转向朱学的同门	(258)
第二节 张履祥“敬义夹持”的工夫论与清初理学的转向	(261)